



第一页与胚胎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陈卫平 · 著

第一页与胚胎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陈卫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陈卫平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7-5495-7142-0

I. ①第… II. ①陈… III. ①东西文化-比较文化-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500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肖莉
特约编辑:李春勇
装帧设计: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0 字数:297千字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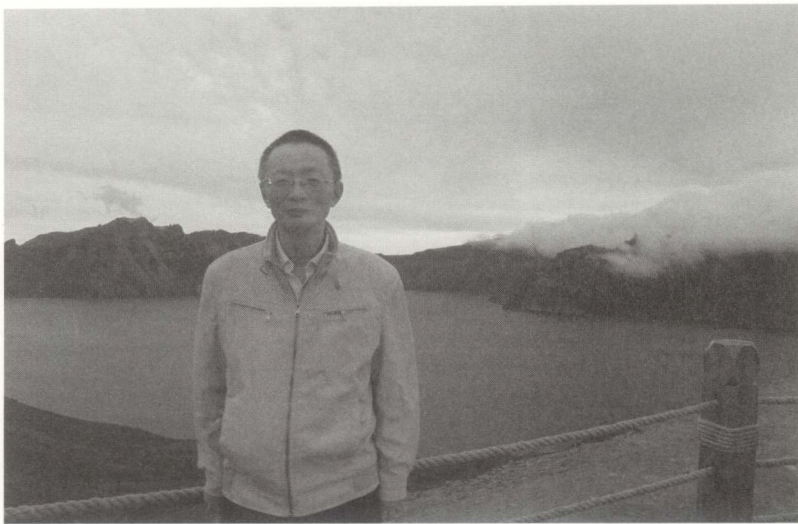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陈卫平,1951年出生,1973—1976年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1978—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1981—2002年)、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2002—2012年)任教。1992年任教授,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首席专家。研究成果曾10次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

总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上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 100 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序

冯 契

对中西文化作比较研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这需要有许多人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去探索。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中西文化的比较已有数百年历史。自晚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开始,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便提上了日程。由西学东渐引起“夷夏之防”传统观念的初步松动,到清朝盛世君主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经过 1840 年后多次战争的失败;先进人物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直至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始终贯串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是复杂的,既有辨异、排斥的一面,甚至在反侵略战争中表现为激烈对抗;也有认同、融合的一面,如从西方学习先进理论,使之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但不论是辨异或认同、排斥或融合,都是对中西两种文化作了比较。显然,这数百年的中西文化比较史,包含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它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做出理论的总结,那是值得我们青年学者用毕生精力去从事的。

陈卫平同志有志于此,在这个方面做了多年探索,发表过多篇论文。最近他写成《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一书,对明清之际(16 世纪末至 18 世纪末)约 200 年间的中西文化由相遇、相识而尝试会通,又发生冲突、抵制以至关系中断的历史,做了颇为系统的论述。我读了全部书稿,为他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我认为,作者在广泛搜集和发掘史料的

基础上,做了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已使本书具有如下的显著特色:

首先,作者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将明清之际至近代的中西文化比较史连贯起来进行考察,把它看作是文化结构和认识过程的合乎逻辑的展开,是时代性和民族性、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中国化”和不“失真”这三对矛盾的运动过程。由此出发,作者在“绪论”中说明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逻辑,在明清之际已初露端倪和略有轨迹可寻,从而论证了他提出的明清之际文化是近代的“胚胎”之说,这是有说服力的。

其次,本书把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比较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下进行具体分析,得出了若干新颖的见解。比如,指出王学风行和实学高涨可说是西学东渐的思想张力,比较细致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蕴含着接受西学的内在因素。这是以往的研究者没有予以充分注意的。又如,着重对明清之际思想家在评价和吸取西学方面的得失做了评析,特别是详细论述了当时对西方科技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盛行的演变过程,由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何以未能在明清之际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推进了一步。

第三,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是与天主教的传入相联系着的。本书对天主教与儒学的冲突及融合,做了具体考察和分析,从中总结了外来文化如何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同时,对西方传教士所作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也给以实事求是的评析,肯定其中有价值的见解。这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

这些都说明本书是一本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作者文笔流畅,颇能引人入胜;全书条理清楚,脉络分明,比较好地做到了史料和观点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以为它出版后是会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赏的。

我自己对这段历史并未做过深入研究,读了这部书稿,觉得颇有启发,促使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如作者所说,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已粗具胚胎,然而它流产了,使历史发生了曲折;那么,造成这种曲折的原因是什么?由此可以得出什么一般性的论断?

在晚明传教士把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输入中国时,曾引起当时有识之士的重大兴趣。如徐光启,他确实是满腔热情地引进西学,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并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在他所从事的天文

历法、数学等领域中付之实践。明清之际学者在“会通”中西科学方面是有成绩的,然而中国并未因受西学的刺激而发生哥白尼式的近代科学革命。演变到后来,反而是“西学东源”说占了优势,引进的西学竟被纳入传统经学的体系。这样的“会通”,便不是创新以超胜,而是复古而倒退了。

一般说来,一种外来文化输入像中国这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需要通过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使之由外来变为内在,才能逐步与本土的传统文化相会通。这种特定“机制”指什么?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会通文化的主体;二是要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在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我批判”阶段,但尚未到崩溃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但很微弱;经过明末的剧烈震荡,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在清初又稳定下来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还没有提供强大的动力促使人们去发展商品经济和探索自然奥秘,还缺乏要求大力发展近代实验科学的社会力量。而若不从事实验科学的研究和不把科学技术运用于商品生产,那是无法领会西方近代科学的真精神的。尽管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和科学家在会通中西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历算等领域也开始找到了中西结合的生长点,但这种“结合”、“会通”毕竟是浅层次的,因为他们对西方文化缺乏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还不可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制度和哲学基础的层次上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当然,如果得到扶植,“会通”的生长点是可能由浅层向深层发展的;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和“华夏中心”论根深蒂固,使得浅层的“会通”蜕变成“西学东源”的比附,由中西结合而萌发的生长点便趋于萎缩;再加上正统士大夫的顽固排外心理和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胚胎”终于流产了。

进入近代,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接踵而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经受了空前的屈辱和灾难;但同时也使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急剧解体,城乡的商品经济则有了发展。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生产组织、政治组织、学校、文化组织等)发育壮大了。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斗争中增强了力量,增长了见识,创造出近代新文化。在文化的创造中,“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密切相联,中国人民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比较、会通

中西文化,在反击帝国主义文化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向顽固的腐朽传统进行冲击,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意识。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开始,继而早期改良派倡“中体西用”说,康有为、孙中山先后宣称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并展开热烈的“东西文化”论战,然后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这些就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首先是其中的先进人物)在文化意识上所经历的主要环节,它们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和会通的线索,体现了浅层结合到深层结合的生长发展,反映了中国人在民主革命进程中的认识的逐步提高。这种提高,从历史观的演变来说,那就是从历史变易观到历史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总之,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文化比较是富有成果的,它也正好证明了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的论断是正确的。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已经由近代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转变为当代的“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进行建设更迫切地要求将中西文化“会通以求超胜”,不过会通的内容已和革命年代大不相同,更不用说明清之际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将是一个东西方各国文化既互相影响、趋于合流,又各自发扬其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所以讨论当前建设中的中西文化比较问题,需要从世界的联系来考察,要求我们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且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是否已能具体说明其机制,理出其发展线索,我不敢说。尽管如此,以史为鉴始终是重要的。陈卫平同志此书,说明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的第一页既有经验又有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此书是个阶段性成果,整个研究还有待于继续。本书只写到18世纪末。从19世纪以来,又近200年过去了,而这后200年比之前200年,其重要性要超过许多倍,所以更艰巨的研究工作还在后头。既然作者已写成“第一页”,读者自然怀着殷切期待,盼望他继续前进,早日完成整个研究计划。而当作者把“第二页”、“第三页”写出来时,回头来看这“第一页”,他可能会对本书中的某些提法做进一步琢磨,贡献出更新的见解。



智慧的探索丛书

阿尔都塞哲学研究

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

古代基督教史

“回到康德”：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之后”

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

结构推理

历史意义的生存论澄明——马克思历史观哲学境域研究

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

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诠释学导论

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修订本)

生命边缘的德性

事实论

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宋儒境界论

《天主实义》与中国学统——文化互动与诠释

味与味道

形上智慧如何可能——中国现代哲学的沉思

用计算的观点看世界

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

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郑忆石著

陈卫平著

徐怀启著

安维复著

陈 赟著

冯 棉著

陈立新著

杨国荣著

晋荣东著

童世骏著

潘德荣著

冯 契著

刘仲宇著

颜青山著

彭漪涟著

顾红亮著

付长珍著

张晓林著

贡华南著

郁振华著

郦全民著

高瑞泉著

方旭东著

目 录

绪论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胚胎 / 1

第一节 明清之际文化的性质 / 2

第二节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缩影 / 9

第三节 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的矛盾端倪 / 17

第四节 “两代人做同一件事”的不同点 / 32

第一章 揭开第一页的历史前提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比较的发生 / 35

第一节 传教士东来和中西文化的相遇 / 36

第二节 王学和实学对西学流播的接应 / 52

第三节 西方世界观念与夷夏传统的冲突 / 67

第二章 近代科学幼芽的天折

——科学家的中西科学比较和会通 / 82

第一节 比较西方“格致”学和儒家“格致”学 / 84

第二节 比较中西科学的思维方法 / 97

第三节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 / 109

第三章 与西学的联系及分离

——后理学的思想家对西学的评价和吸取 / 127

第一节 方以智和王夫之论西学的“质测”和“通几” / 128

第二节 戴震和焦循融西学于经学 / 146

第四章 冲突与调和

——西方传教士的“天儒同异”之辩 / 163

第一节 天主教的儒学化 / 164

第二节 中西哲学的若干比较 / 186

第五章 儒家文化传统的回击

——正统士大夫“破”西洋“邪说” / 200

第一节 用“华夏中心”论抵制西学东渐 / 202

第二节 用“义理为本”论否定“夷技” / 211

第三节 用儒学天道观和伦理观驳斥天主教 / 217

第六章 节取技能而禁传学术

——封建君主对西学的选择 / 227

第一节 末朝君主无可奈何的宽容 / 228

第二节 新朝君主局部限制的开放 / 236

第三节 盛世君主中断西学东渐 / 245

附录一 徐光启与明清之际思想世界的重建 / 251

附录二 明清之际的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 / 263

主要参考文献 / 281

索引 / 289

后记 / 299